

高等学校法语专业用

COURS de
TRADUCTION
du Français
en Chinois

陈宗宝 编著

法
汉
翻
译
教
程

5.9

海译文出版社

教育部“十二五”规划教材

COURS de TRADUCTION du Français en Chinois

第二版

法
汉
翻
译
教
材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高等学校法语专业用

法汉翻译教程

陈宗宝 编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法 汉 翻 译 教 程

高等学校法语专业用

陈宗宝 编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丹徒人民彩印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9.25 字数238,000

1984年6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3次印刷

印数：8,001—9,000册

ISBN7—5327—0162—X/H·052

定价：2.70元

前 言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一九七七年十月南京法语教材规划会议的决定进行编写的。经过几年试用和多次修改，于一九八三年五月经全国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法语组审查通过。本书可供高等学校法语专业三年级或四年级法汉翻译教学使用，也可供法语专业研究生和对法汉翻译工作者学习参考。

本书于一九七九年秋开始编写，曾给法语专业三、四年级学生试用了三年，给研究生试用了一年。实践表明，在法汉翻译教学过程中，比较系统地介绍有关翻译知识和翻译技巧，对于端正学生的翻译态度，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提高学生的翻译熟练程度，都是有一定帮助的。

自从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翻译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世界上不少语言学家和翻译家都致力从理论上对翻译进行探讨，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尤其出现机器翻译以后，翻译更是成了一门综合性的边缘学科。今天，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的研究，在国内已引起广泛的注意和普遍的重视。

翻译教学在外语教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因为翻译是检查学生综合运用两种语言能力的一种有效的练习，而且是帮助学生能较快适应翻译工作的一种必要的训练。对于翻译教材的编写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涉及面要广，文史、政治、经济、科技等等都应该接触到一点，以便学生毕业后能适应各类翻译；另一种认为主要应集中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因为文学作品的语言最丰富、最生动，文学翻译若有一定的基础，从事其他各类的翻译自然也不成问题。我们倾向于后者的看法，因为各类翻译尽管有所侧重，但各类翻译的原则是一致的；其次，因为本书篇幅有

限，面面俱到势必流于浮泛。因此，本书的内容和所列举的译例，几乎都是文学作品的翻译。

本书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一、一般的翻译知识；二、常见的翻译技巧。翻译知识包括我国的翻译简史、翻译原则和方法等等。翻译技巧包括法语词句和若干主要语言现象在汉译时常见的处理方法。所引的例句绝大多数是从国内已翻译出版的法国著名文学作品中摘录下来的，因此针对性较强，适用范围也较广。摘引的译例中，有个别字句值得商榷的，一般都附有说明，但因为书中引证的译例较多，难以逐一推敲，所以引证的译例仅供参考，而不是范译。另外，在翻译技巧部分，每章后面都附有翻译练习的短文，教师也可以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另选其他的翻译材料。

本书内容可供一学年使用。法汉翻译一般每周为二学时。我们的做法是：一周讲评翻译作业，一周介绍翻译知识和技巧。有时在学生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也组织堂上讨论。实践说明，讲评与介绍相结合，是提高翻译教学质量的较好方法。在翻译实践的基础上，提高到一定理论高度，再运用所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指导翻译实践，这是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的。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抓住三个环节：理解，表达，讲评。理解是翻译的前提，表达是翻译的核心，讲评是翻译的深化。当然，要提高翻译水平，关键是提高学生法汉两种语言的水平和运用能力，离开了这个前提，任何翻译理论和技巧都是无用的。

参加一九八三年五月大连法语组教材审稿会议的除编者外，有编委赵俊欣、李廷揆、郭麟阁、岳扬烈、唐志强、王德华、徐百康、王名扬、王嘉瑜、马炳华、（秘书）路汉恩，以及杨维仪、穆大英、李秀琴、钱锦清、靳平妥、高锡九等同志；本教材主审人为岳扬烈、唐志强。上述同志对本书送审稿提了不少修改意见。在本书编写过程中，赵俊欣教授曾提了许多宝贵意见。现趁本书出版之际，谨向上述诸位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著者

一九八三年七月

于南京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我国翻译史简况	1
第一节 佛教经典的翻译.....	1
第二节 明清时期的翻译.....	5
第三节 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	12
第四节 法国文学在我国的翻译.....	22
第二章 翻译标准和方法	28
第一节 翻译原则研探.....	28
第二节 翻译方法浅析.....	37
翻译练习.....	52
第三章 翻译的重要环节之一——词义精当	55
翻译练习.....	72
第四章 翻译的重要环节之二——句调相仿	74
翻译练习.....	92
第五章 翻译中的词类转换	95
第一节 名词的转换.....	96
第二节 动词的转换.....	99
第三节 形容词的转换.....	101
第四节 副词的转换.....	104
翻译练习.....	108
第六章 法译汉常用的方法与技巧(一)	110
第一节 顺序译法.....	112
第二节 逆序译法.....	114
第三节 增词译法.....	119
第四节 减词译法.....	125
第五节 分拆译法.....	129
第六节 合并译法.....	137
翻译练习.....	140

第七章 法译汉常用的方法与技巧(二)	145
第七节 同义反译.....	145
第八节 主次转换译法.....	148
第九节 插入译法.....	156
第十节 抽象与具体转换译法.....	158
第十一节 拟意译法.....	161
第十二节 重迭与反复.....	166
第十三节 行文与习语.....	169
翻译练习.....	172
第八章 状语的处理方法	178
第一节 介词结构状语的译法.....	178
第二节 连词结构状语从句的译法.....	182
翻译练习.....	190
第九章 关系从句的处理方法	194
翻译练习.....	200
第十章 法语时态的处理方法	204
翻译练习.....	211
第十一章 法语冠词的处理方法	214
翻译练习.....	222
第十二章 形象比喻的处理方法	227
第一节 比喻的形式.....	227
第二节 比喻的常用译法.....	232
翻译练习.....	240
第十三章 感叹词的处理方法	246
翻译练习.....	264
第十四章 漫谈诗歌翻译	268
翻译练习.....	284
主要参考书目和资料.....	287

第一章 我国翻译史简况

我国是个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在几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它曾以灿烂的文化，先进的生产技术，对人类作过重大的贡献。早在几千年以前，它就同其他民族有着文化、贸易的往来。可以推断，随着这种往来的发展，翻译应当自古有之。

单是见诸于文字的翻译，距今也有近二千年的历史。据史书记载，佛教传入我国是在公元 67 年，即汉明帝永平十年。汉明帝曾派郎中蔡愔和秦景前往天竺去求佛经。蔡、秦二人带回了四十二章佛经。随同他们来中国的有天竺两位博学的僧徒，一个叫摄摩腾，一个叫竺法兰，两人在洛阳鸿胪寺主持佛教的仪式。有些佛教史书说，他们译了《四十二章经》。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提到佛教经典最早翻译的一部了，一般都认为《四十二章经》是我国佛教最初的译籍。

尽管佛教史家们对《四十二章经》是不是汉代所译，至今看法仍有分歧，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国翻译事业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一点是不会有异议的。

纵观近二千年的翻译史，译家如林，译品似海。这是我国文化宝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许多译家和译品，对我国的文化曾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尤其前人在长期翻译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提出了许多有关翻译的精辟论述，如能加以研究和整理，无疑对我们今后发展翻译事业，提高翻译水平，都是十分有益的。

第一节 佛教经典的翻译

在我国翻译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翻译事业是佛教经典的翻译。在历代众多经译家当中，最著名的有鸠摩罗什、真谛、

玄奘和不空，他们被誉为佛典翻译的四大译师。现将历代佛教经典的翻译作个简要的回顾。

我国佛典翻译事业，始于东汉末叶桓灵二帝时代(147—189)。其时西城佛教学者如安世高、支娄迦谿、竺佛朔、康孟祥，相继来华，从此佛典翻译便逐渐盛行起来。在上列佛教学者当中，安世高译籍最多，影响最大。他后先译了三十多部佛经。

三国时期，致力于佛典翻译的著名僧徒有十来人，当中以支谦尤最。他所译佛典涉及大小乘经律计八十八部。他译典均采用意译，文体简洁流利，并且还为所译经典作注，成为经注的首创。

西晋时期从事译经的著名译者当中，最有名的是竺法护，先后译出大小三藏经典一百五十四部。西晋一代译经，文体与三国时期的相反，重视本旨而轻视文饰，译文晦涩难懂，为后世研诵者不多。

东晋时代南北两地的佛典翻译，作出了许多超越前代的业绩。在众多译师当中，最有名的要首推前秦道安和后秦鸠摩罗什。道安(312—385)主要的贡献不是从事译经，而是组织经译，并对译本审定音字，详核文旨，亲自作序。他还创编经录，疏注众经，提出有关翻译的论述。他堪称是经译的组织者兼评论家。而鸠摩罗什却是佛教史上译经大师。鸠摩罗什(344—413)从小出家，深谙佛经，“道震西域，声被东国”。公元401年，他到达长安，专门从事译经和讲学，共译出经籍七十四部，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罗什译经，不仅注意内容的考证，而且十分讲究文字的推敲。《大唐内典录》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时有僧睿法师，甚为(姚)兴(所)知，什所译经，睿并参正。昔竺法护出《正法华·受决品》云：‘天见人，人见天。’什译至，言曰：‘此语与西域义同，但在言过质。’睿应声曰，将非‘人天交接，两得相见’乎？什大喜曰：‘实然！’”从这故事里可以看到罗什译经那种一丝不苟的态度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东晋时代的佛典翻译，创造了一种融洽梵汉的新体裁，可称为翻译文学，到鸠摩罗什已渐趋成熟。罗

什所译经论，文澜壮阔，宏伟瑰奇，很有文学价值。

南北朝出现另一位译经大师，名为真谛。真谛(499—569)从扶南带了许多梵本经论，于公元546年来到中国。他在梁、陈两代共译出经、律、论、集四十九部。尤其令人敬佩的是他从事翻译的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他在中国二十三年间，正值梁末陈初，战祸不断，烽火连绵，所留下的这许许多多译籍，都是他在流浪颠沛、备尝艰苦之中完成的。

隋代出了一个积极参预译事的本国佛教学者彦琮。彦琮谙习梵文，他是我国佛教史上把佛经译为梵文的第一个译者。他还结合历代译经的经验，首次较有系统地提出翻译的模式，有“八备”之说。关于“八备”的详细内容，我们将在第二章论述翻译原则时再作介绍。

到了唐代，译经事业达到了鼎盛时期。唐代译家之多，译场规模之大，都是历代所不能比拟的。唐代著名译师多达二十多个，最显赫有名的是玄奘，其次是不空和义净。玄奘精于瑜伽、般若、大小乘、毗昙，译经多达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不空专于密教，译经达一百零四部一百三十四卷。义净着重律典，共译经六十一部二百六十卷。唐代共译出佛典三百七十二部二千一百五十九卷。

玄奘(约600—664)是我国佛教史上最著名的佛教学者和译经大师。他于贞观元年(627)入长安，“遍谒众师，备餐异说，详考其理，各擅宗途，亦隐现有异，莫知适从”，因此“誓游西方，以问所惑”。于是次年，遂从长安出发，经过四年艰难跋涉，终于到达天竺。他在天竺游学十七年，钻研佛学各派学说，因而对佛学有很高造诣，誉满天竺。公元645年，学成回国，随在长安致力译经。

玄奘以前，译经一般先依梵文语法译成汉文，然后改成汉语语法，再由笔人修整文句，因此中间增减，难免有失原意。玄奘精通汉文和梵文，又深谙佛学，因此译经时出语成章，笔人随录，

即可披玩。他所译的佛典，在佛教译经史上开创了一种新文体，被称为“新译”，足见其影响之大了。

不空(705—774)原是北印度人，自幼随叔父来中国。十五岁时出家，从学密教。公元741年赴印度和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寻求密藏梵本。公元746年回国，遂致力于密教经典的翻译。义净(635—713)是在玄奘之后赴天竺求法的僧人中成就最大的一个。他于公元671年出国求法，经二十五年，历三十多个国家，于公元695年回到洛阳。回国后，即致力于律典翻译。

大抵我国佛经的翻译，到了玄奘已达到顶峰，以后各代的经译家没有人能超过他。唐代以后，佛教的影响虽然仍很强大，但佛经的翻译却逐渐衰微了。五代盛行的是写经阅藏，译经很少。

宋代又一度大兴佛教，先后派了一百五十七个僧人去印度求经。印度不少僧人也先后来到中国。宋朝廷还专门设立译经院，恢复佛典翻译。不过，宋代译经的质量，远不能和前代相比，特别是有关义理的论著，常因笔受者理解不透，译文艰涩难懂。

然而，宋代译经，有一整套严密的组织体系，例如译场人员分工很具体，设有译主、证梵义、证梵文、笔受、缀文、参详、证义、润文等，组织相当完备。译经院后来还附带培养翻译人材，改称传法院。这是我国历史上有目的培养译人的创举。

宋代天圣五年(1027)以后，佛经译业日趋衰落，其原因有二：一是缺乏新经梵本，因而译事时断时续；二是宋代译籍中，以密教典籍居多。宋代统治者注意到密典中有些部分和佛教传统不一致，遂下令禁止密典的翻译，这就大大限制了后来佛经的翻译。

综上所述，从我国历代佛经翻译的情况来看，有几点是很有启迪意义的：

一、自从有了文字翻译，就存在着翻译方法的分歧。从经译史上看，硬译与意译这两种方法，恰好是交替发展的。例如：

后汉 安世高、支谶 硬译

三国	支谦	意译
西晋	竺法护	硬译
东晋	鸠摩罗什	意译
南朝	真谛	意译
北朝	隋	多硬译
唐	玄奘	意译
宋		多硬译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是说明硬译方法有什么优点，而是因为采用这种方法的译师多是外籍人，他们精通梵文，却不精通汉语，而笔受者又往往精通汉语，却不精通梵文。这样就出现按照原著生搬硬套的翻译方法。与此相反，译师若是精通梵、汉两种文字，必然采取意译方法，译文流畅，影响也较大。

二、译人渐渐由外籍人转为本国人，从安世高到玄奘，这期间正是这一转变过程的反映。另一方面，中国译人的培养也渐渐由国外转为国内，这说明在国内也可以培养出翻译人材来。特别是到了宋代，专设传法院，这种培养方法已成为有目的、有组织的了。我们今天各类外语院系，其源可溯至宋代，只是性质不同罢了。

三、译经的组织工作，经过历代的努力，益发严密。从最早独个翻译，发展到后来设立译场、译院，规模甚为宏大。同时，为了保证译文质量，译场分工也更加明确，真可谓层层把关，各负其责。这种重视翻译质量的做法，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四、许多著名译师对待翻译那种一丝不苟的态度，精益求精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罗什对译文逐字推敲的严肃认真的态度，真谛在颠沛中坚持译业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玄奘对义理求真的严格作风，都是令人敬佩的，也是值得我们仿效的。

第二节 明清时期的翻译

到了明清两代，佛经翻译已微乎其微，继之而起的是翻译泰

西文化的热潮。

明末随着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加上当时西方传教士相继来华，带来了一部分应用科学，于是一些士大夫遂注意科学的研究，并努力介绍所谓泰西文明。

公元1580年以后，一批西方天主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他们为了传教，先以传授西方科学，炫耀西方文明为手段，来争取一些士大夫的支持，结果取得了很大进展。当时不少知名的知识分子，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征等，都加入了天主教。这些知识分子都致力把西方的基本科学和逻辑思想介绍到中国来。

徐光启(1561—1633)早年就致力于天文、历算、农田、水利的研究。后来认识传教士利玛窦，便开始“西学”的探研。他与利玛窦合译了《几何原本》六卷，介绍了欧几里德平面几何。他在水利方面译有《泰西水法》，测量方面译有《测量法义》。另外，他还把欧洲天文学中一些先进的知识介绍进来，如更简捷精确的球面三角计算公式，以及“地球”、“地理经纬度”、“时差”、“蒙气差”等概念。

徐光启之所以重视西方科学基本知识的介绍，这是因为他认为：“倡实心实行实学，以践形尽性；故谓言法言理，必言革言故。言法不言革，似法非法也；言理不言故，似理非理也。”（《简平仪说序》）显而易见。他通过翻译，不单单是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而且还要介绍治学方法和逻辑方法。这在当时是有着进步意义的。徐光启在翻译上内容准确，文字通俗易懂。他是我国历史上把拉丁文数学书译成中文的第一个译者，绝大多数汉语名词都得靠他自己创造。如今几何上许多专门名词和术语都是他首先使用的，诸如几何、点、线、面、平行线、钝角、锐角、三角形、四边形、斜方形等等。这是徐光启对我国数学发展的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翻译西方科学著作还扩及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和逻辑学。如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了《浑盖通宪图说》二卷、《圆容较义》一卷、《同文算指前编，通编，别编》十一卷，又编著《天

学初函》五十二卷。王征译了《远西奇器图说》四卷，介绍普通物理学中重心、比重、杠杆、滑车等原理以及简单机械构造。杨廷筠译了外国地志，集成《职方外志》五卷，介绍世界地理知识。

在上述这些人译著中，影响最大的是李之藻翻译的逻辑书《名理探》。这是我国介绍西方逻辑学的第一部译著，当时特别引人注目。《名理探》原名是《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概论》，全书二十五卷。李之藻只翻译了其中十卷。这部书基本上是代表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逻辑思想的。李之藻译这本书，其思想动机是保守的。这是因为当时随着科学知识的发展，古典唯物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也有进一步发展，而李之藻却想用经院哲学的逻辑思想，来抵制古典唯物主义的逻辑思想的发展。尽管如此，他为了翻译这本逻辑著作，精心创造了许多逻辑术语，力求做到达意而又通顺，如用直通、断通、推通来表达概念、判断和推论，以明辩、推辩来表达演绎、归纳，以致知、致明、致用来表达科学、理论和实用，有的术语一直沿用至今，所以其译绩是不可抹杀的。

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影响不仅限于明末，而且及于清初。然而清代到了雍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对外逐渐采取闭关政策，西方科学知识自然不太可能再被介绍进来。直至鸦片战争以后，腐朽没落的清皇朝，在帝国主义侵略者面前完全暴露出其虚弱的本质，一下子从闭关自守转变为卖国投降。在民族危难的关头，一些有志之士希望从西方找到救国自强的药方。因此，西方的学术文化和自然科学，又应运被介绍到中国来。我国翻译史上又增添了新的一章。

清末通过翻译以鼓吹革新的，就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严复。严复(1853—1921)不仅是我国翻译史上著名的翻译家，而且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有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思想家。他原是学造船的，后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在英国近三年的留学期间，热心于研究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科学，想从中找到救亡图存、变法图强的方法。因此回国后致力于译介，对戊戌变法

时期提倡维新改革起了积极作用。

严复前后翻译西方的学术著作有：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以及《穆勒名学》、《名学浅说》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天演论》。

《天演论》原名是《进化论与伦理学》，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在牛津大学讲座的讲稿。严复选择这本书，是含有明确的政治目的的。他认为种族国家之间，也象生物界一样，是相互竞争的，强者胜，劣者败。他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原理，大声疾呼，向全国敲起民族危亡的警钟。这在当时中国思想界起了发聩震聋的启蒙作用，并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严复把翻译作为抒发自己感情，寄托自己思想的一种手段，因此开创了一种新的翻译模式，译文加评介。他采取这种做法的动机，我们可以在他《名学浅说·译者自序》中得到说明。他说自己译书，“中间义旨，则承用原书；而所引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显然，严复译《天演论》是想借它去阐明一个中心课题：中国如能顺应“天演”，就能由弱变强，否则就有被淘汰的危险。因此，读《天演论》的人不一定对译著的内容有很深的印象，相反地，倒被译者那种忧国忧民、力图自强的精神所震动。

还值得一提的，是严复在翻译逻辑学术著作时，也创造了许多逻辑词汇，有的比李之藻所创造的还更接近现代的说法。严复在谈及翻译的甘苦时，曾说“一名之立，旬月踟躇”。这说明他对待翻译的态度是何等严肃认真啊！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梁启超(1873—1929)，却竭力提倡政治小说的翻译，把政治小说看作是启发民众、鼓吹变法维新的有力工具。所谓政治小说，是指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初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治家们抒发政见的那类小说。1896年，他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这篇序中可以看